

左图右史 图史相因

——《河南志》对唐宋洛阳城研究价值的再认识

王书林

提 要：《河南志》保存了大量宋本原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故为学界广泛重视。将《河南志》志文与图对照阅读和研究，可知其志文严谨、与历史文献及考古材料可互证。更为重要的是，《河南志》图所表现的一些细节，反映了城市格局和城市空间关系，为我们认识唐宋洛阳城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河南志》 洛阳城 城市考古

一 《河南志》概述及版本流传

北宋以前，洛阳地区长期处于古代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敏求著《河南志》，上起周代，下至北宋中期，详述其历代废兴，内容涉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等^①，丰富详备，堪称历代洛阳志之集大成者。

至明末清初，宋敏求《河南志》已散佚不可得。^②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奉诏纂辑《全唐文》，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部分佚文成集，题为《河南志》（永乐大典本）^③，但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后该书归袁漱六之卧雪庐所藏。光绪十年（1884），卧雪庐藏书散出，该书为翁同龢购得。缪荃孙从翁家求来，录副细校。光绪三十年，由梓人丁德洲刻于金陵，三年乃成，改名为《元河南志》，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中。^④

与上述志书相关的已出版的洛阳图，有以下几种版本：

1. 《永乐大典》卷9561中的河南府图33幅，中华书局版《河南志》中印出（简称“大典本”）；
2. 道光四年（1824）庄璟摹本14幅（赵万里藏），中华书局版《河南志》中印出^⑤（简称“庄本”）；

① 参见司马光：《河南志序》：“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5》，巴蜀书社，2009年，第173页。

② 参见张保见：《宋敏求〈河南志〉考——兼与高敏、党宝海先生商榷》，《河南图书馆学刊》第23卷第5期。该文经过检索历史文献（包含碑刻、墓志等史料）对于《河南志》的流传和散佚进行了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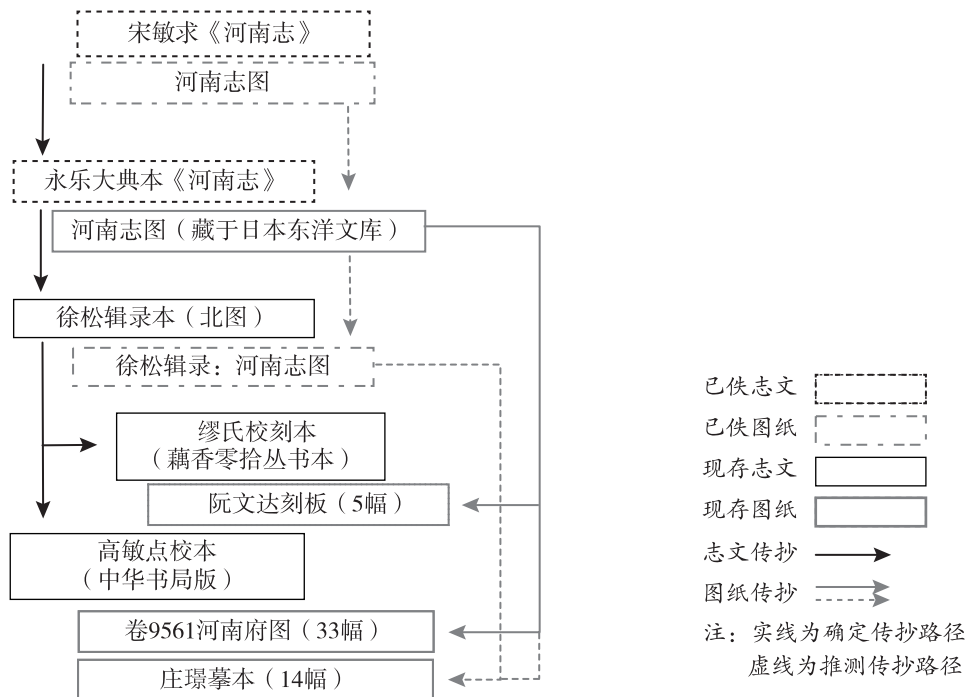
③ 参见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229页。

④ 参见缪荃孙：《河南志跋》，缪荃孙编：《藕香零拾》，中华书局，1994年，第235页。

⑤ 参见作铭（夏鼐）：《永乐大典卷九五六一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原书（《永乐大典》卷9561的《元河南志》）现藏日本的东洋文库……说这册庄璟绘本是徐松的，自然是可能的。”《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3. 阮文达刻版魏晋四朝洛阳宫殿图,入藕香零拾丛书(缪氏校刻本)^①本(简称“阮本”)。

综上,河南志志文和图之版本流传可概要如下:



从图纸的传抄过程看,庄本、阮本应源自大典本。但大典本绘制非常简略,很多细节并未表现。而庄本、阮本的绘制却细致很多,与志文更为贴切,且在图上配有殿名,或为传抄中根据志文对图纸进行了修订的缘故(参见图1)。而对比庄本、阮本图纸,则各有优劣,可互补缺,兹举二例。

其一,后魏京城图:《河南志》载:“明堂,宣武八年诏建,孝明正光中始成,在辟雍之西南。”^②阮本“后魏京城图”中明堂即在辟雍之西南,而庄本中明堂和辟雍并排而置,未反映其相对位置关系。

其二,宋西京城图:《河南志》载:“兴教门内曰左安礼门……东偏斑院。在杂纳库北。□偏□坊。光政门内北中书。在应天门东。中书西,右安礼门。□库之景运门,然稍在西,不对光政门。次西横门,曰永福门。按,后唐同光建,左、右永福门,在□□□南,疑兴善门是。门西北,三司,次西斑院。右安礼门北,曰右兴善门。唐右银台门,梁开平三年改。”^③阮本描绘了“右安礼门不对光政门”这一格局,却在光政门以东,而庄本光政门与右安礼门位于同一轴线上。庄本图中左银台门之西偏“教坊”或可补“□偏□坊”之文字缺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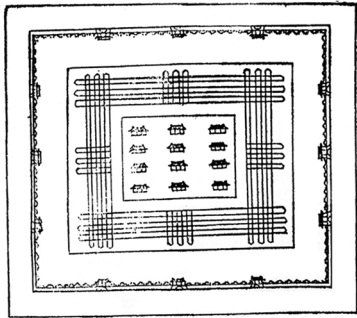
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应结合志文,对图纸进行考订和对校。

① 藕香零拾本《元河南志》前引5图,参见缪荃孙言:“余(阮元)于嘉庆十五六年间,在京师文颖馆总阅《全唐文》时,《永乐大典》多移在馆。有馆中供奉钞得东汉东都城图一纸,西晋洛阳京城图一纸,后魏洛阳宫城图一纸,金塘城图一纸,余阅而喜之。……阮仅以汉晋洛阳宫城图标题,而宋西京城图亦附存焉,入之此志,丰城剑合矣。”缪荃孙:《河南志跋》,《藕香零拾》,第2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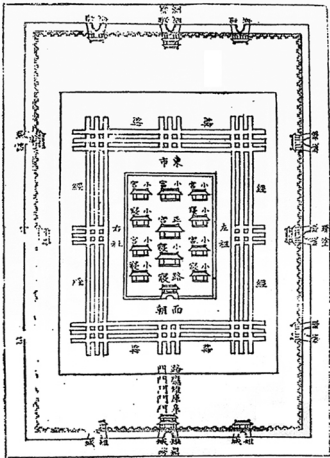
②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90页。

③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47—148页。

周王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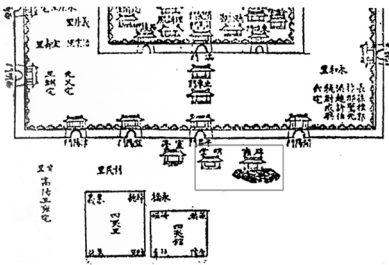


大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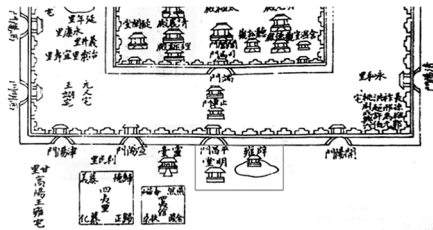


庄本

后魏京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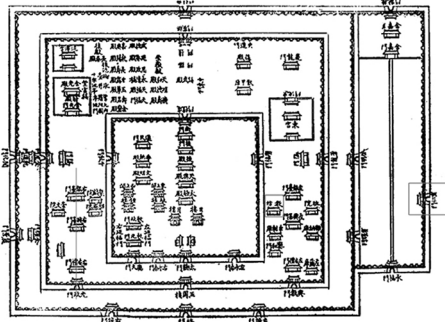


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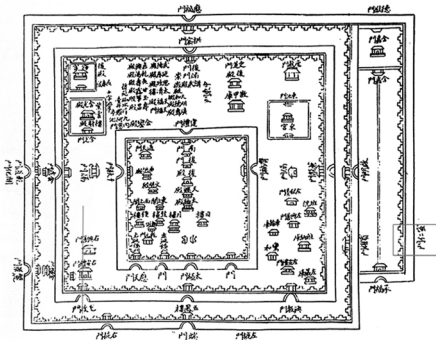


阮本

宋西京城图



庄本



阮本

图 1 各版本图纸对比示例

二 关于现存《河南志》成书年代的讨论和相关研究

由于《河南志》对于洛阳地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性,自徐松发现并辑录《河南志》至今,历代皆有治学者致力于《河南志》的研读及对其成书时代的探索,且影响甚广,兹按发表时间顺序对诸学者之看法予以概述。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己巳之岁,奉诏纂辑唐文,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图,证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载,灼是次道旧帙,其源亦出于韦述《两京记》,而加详焉。亟为摹钞,爱同球璧。……是唐宫省之图在宋时已珍重如斯,况于今又数百年后哉。”^①徐松将《永乐大典》之《河南志》、图与玉海、禁扁对照后,言为次道(即宋敏求)旧帙。

沈垚阅《河南志》后,在《沈垚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中发表见解:“是志实出元人之手,而宫殿、坊市则直录宋敏求之书,间加改窜。……盖其时敏求书具在,故宫殿、坊市尽录原文,而略加金元事一二条。……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是志非全本……可见原书具载属县……可见第宅、寺观,原书又别载其详。是册特全书什之一二耳。而讹字甚多,秋冬当取新旧唐书及诸史细为校正也。”^②对志文提出3个看法,颇为精辟:一是该志出自元人之手;二是宫殿、坊市等主要录自宋敏求《河南志》,略加金元事一二条;三是志非宋敏求全本,缺佚和讹字较多。

缪荃孙指出:“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方知《大典》所录为元《河南志》,而仍是宋志原文。至述元时,寥寥数语,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③认其为元《河南志》,并收入藕香零拾丛书。于是,是志为元《河南志》这一观点伴随藕香零拾丛书的刊印而广为流传。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高敏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④,以《河南志》文的细致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论述该志为元人所撰。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行文中有大量元代人撰修的痕迹,而在宋志中则不可能出现;二是徐松辑录时对元志进行了删减,缪氏校刻本在分卷、书写格式、避讳等方面也留下了缪氏烙印;三是元志的撰写体例依自宋志,且很多文句完全抄自宋志原文。1994年,由高敏点校的《河南志》在中华书局出版,高敏的观点也因文末《〈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而影响深远。

1996年,周正春在论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长安志》的提要时,顺及《河南志》,从凡例、记事、引书等方面证明缪氏所刻元《河南志》为宋氏之书。^⑤

2001年,党保海发表《〈元河南志〉质疑》^⑥,从《永乐大典》为辑录体类书这一性质出发,认为徐松在《永乐大典》中所看到的关于《河南府·古迹》的内容不可能仅来源于一本志书,分析志文内容后,认为其包含宋、元、明三个朝代的文字,进而考其为宋敏求《河南志》、

①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② 沈垚:《沈垚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24—225页。

③ 缪荃孙:《河南志跋》,缪荃孙编:《藕香零拾》,第235页。

④ 参见高敏:《藕香零拾丛书本〈元河南志〉书后》,《郑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高敏:《〈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部分质疑》,《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1980年;高敏:《〈永乐大典〉本〈河南志〉跋》,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29—250页。

⑤ 参见周正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提要辩证》,《浙江学刊》1996年第3期。现存《河南志》所叙内容和体例皆与《长安志》类似,大抵对应其卷3至卷10的部分内容,即为古迹部分。

⑥ 参见党保海:《〈元河南志〉质疑》,《历史地理》第十七辑,2001年,第398—407页。

元代《大元一统志》、明初《洛阳志》等相关内容的汇编。

如此,关于《河南志》之成书年代即呈现出“宋志说”“元志说”和“明汇编说”^①等3种看法,其中元志说之影响最为深远。

三 《河南志》志文的史料价值

上述诸学者对于志书成书年代有所争议,但有一点却已达成共识,即该书中大量内容直接转录自宋敏求《河南志》原文^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司马光《河南志·序》记:“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次道既没,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即文彦博),其子庆曾等奉《河南志》以请于公,曰:‘先人昔尝佐此府,叙其事尤详,惜其传于世者甚鲜,愿因公刻印以广之,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从之,且命光为之序。”^③

由此观《河南志》成书,宋敏求对于唐代(前朝)的描述多有引用和考证,而对于宋代(当代)的描述更是陈述事实,以呈洛都之盛,所记应该可靠且准确。因此,《河南志》对唐宋洛阳城城市史的研究至关重要。

通读《河南志》志文,并将其与隋唐洛阳城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比,可见如下特点:

其一,成书严谨。如《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中,以宋代一百二十坊为纲,考隋唐遗迹。文中多处出现里坊名称和数量统计,皆可完全对应^④,可见其纂修之谨慎严密,颇为可靠。

其二,可与其他历史文献互证。如《河南志》集贤坊条记:“中书令裴度宅,园池尚存,今

① 关于《河南志》成书年代的3种看法,自党保海以后,探讨仍不绝于耳,如张保见:《宋敏求〈河南志〉考——兼与高敏、党保海先生商榷》,《河南图书馆学刊》第23卷第5期,第79—82页。但有所变化的是,更多的学者试图避开其成书年代的争论,从其大量辑录宋代原文的事实出发,探讨其学术价值,如田青刚:《宋敏求与〈河南志〉》,《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4期,第145—148页;薛瑞泽:《试论〈河南志〉的学术价值》,《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1卷第1期,第72—76页。

② 关于现存《河南志》大量内容源自宋志原文,前述学者提出的理由包括:(1)行文中保存了若干反映宋代时间概念的“今”“国初”“国朝”等字样;(2)描述宋代诸坊情况时,只书年号,而不冠以朝代;(3)描述唐宋城内诸坊情况时,没有一条属于宋敏求死后的;(4)多处文字避讳、语气等都显示其照抄自宋本。此外,现存《河南志》京城中关于郭城、皇城、坊市部分的叙事逻辑、描述内容、文字结构等均与《长安志》相近,故其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甚大。

③ 司马光:《河南志序》,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5》,第173—174页。

④ “凡一百二十坊。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今八十八坊隶河南县,三十二坊隶洛阳县。……《洛阳志》云:凡一百二十坊。”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3页。“(定鼎)街东凡六坊……定鼎门街东第二街,凡六坊……定鼎门街东第三街,凡八坊……定鼎门街东第四街,即长夏门之西街,凡七坊……”(6+6+8+7)=(27)“右定鼎门街东,长夏街西,南至城,北至洛水,坊二十七”。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5—11页。“长夏门街之东第一街,凡八坊……长夏门街之东第二街,凡九坊……长夏门街之东第三街,凡十一坊……长夏门街之东第四街,凡八坊……长夏门街之东第五街,凡八坊……”(8+9+11+8+8)=(44)“右长夏街之东,南与东至城,北至洛水,坊四十四”。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1—23页。“定鼎门街之西第一街,凡六坊……定鼎门街之西第二街,凡六坊……定鼎门街之西第三街,即厚载门街,凡五坊……”(6+6+5)=(17)“右定鼎门街西,坊十七”。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3—27页。而上述27+44+17=88,恰为隶河南县之八十八坊。同样,洛河北岸隶洛阳县之三十二坊也可完全对应。

号‘湖园’，属民家。太师致仕卢钧宅，失处所。太子太师致仕吕蒙正园。”^① 志文中提到的两处园林——裴度湖园^②、吕蒙正园^③在唐宋其他文献中多有印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三，可与考古勘探发掘成果互证。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迄今已进行60余年，所涉范围包括城墙、城门、里坊、宫殿、道路、仓库、桥梁、园林等诸多方面。城市的城圈结构、宫城皇城格局、里坊方位等考古发掘成果与《河南志》的记载非常吻合。^④

四 《河南志》图的价值

自徐松从《永乐大典》辑抄《河南志》后，其主要被用于洛阳古都复原、城市史及城市考古的研究，特别是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掘和城市历史研究。^⑤ 但学者们重视对志文的研读和考补^⑥，对图纸的利用尚不够充分。^⑦

以《河南志》中《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宋城阙图（宋西京城图）》为例，其或得到考古工作的证实、或可与文献互证，很多细节值得关注和思考，兹举几例证之。

其一，街道尺寸。建春门街：“由建春门门址往西，经梁家寨北，穿过长夏门街，经王庄北与定鼎门街西第一街相接，再在西即断灭。此街自建春门到长夏门街一段保存较好，在2800多米长

① 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6页。

② 集贤坊湖园，乃裴度宅园。白居易的多篇诗文中有所提及：“……公今在何处？守都镇三川。旧宅留永乐，新居开集贤。”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8页。《代林园戏赠》：“裴侍中新修集贤宅成，池馆甚盛，数往游宴，醉归自戏耳。”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第490页。《和刘汝州酬侍中见寄长句因书集贤坊胜事戏而问之》：“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贤来往频。一复时程虽不远，百余步地更相亲。”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第495页。“湖园……在唐为裴晋公宅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11页。

③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第12页。“伊水分二支。西支正北入城。……东支东南入城，经兴教坊西，又折而东流，经宣教、集贤之南，又折而北，经履道之西，以周其北，又东经永通之北……”徐松撰，张穆校补、方严点校：《唐两京城坊考》，第179页。由上可知吕蒙正园在伊水沿岸（上流），伊水经集贤之南和东并往北而去，与《河南志》中吕蒙正园在集贤坊的记载可互为佐证。

④ 自洛阳考古工作开展以来，《河南志》就成为考古勘探、发掘和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为考古工作提供方向指引和文献支持。《河南志》这一文献材料的利用，贯穿了几十年来洛阳城考古工作的整个过程，从1954年阎文儒带队调查汉魏隋唐城址，到后来应天门、定鼎门等门址的发掘，以及上阳宫、九州池的发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一再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⑤ 《河南志》志文和图纸虽涉及周至宋六朝，但主要用于北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的研究，且以隋唐洛阳城为多。

⑥ 学者们也利用其他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河南志》的叙述进行考订，以校正我们对于洛阳城的认识。以徐松所编《唐两京城坊考》为基础，陆续有学者对唐东都里坊进行考证和补充，如程鸿诏：《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丛书集成续编》第5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75—585页；阎文儒、阎万钧编：《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杨希义、陈忠凯：《唐代墓志中所载的长安坊里》，《文博》1988年5期；程存洁：《〈唐两京城坊考〉东都里坊补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周晓薇、王其祯：《隋东都洛阳城坊考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等等。

⑦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是基于《河南志》志文和图而编写的，目前考古工作对于洛阳城的复原图也是以《河南志》唐东都城图为基础的，其余的研究利用图纸者较少，如侯卫东《元〈河南志〉巩县城池图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

中路土从未中断。残宽41米，路土厚0.4米。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残宽仅21米，厚0.2米。”^①

永通门街：“此街东端由何村南起，往西经狮子桥村南，穿过郑村，再经赵村北、直抵定鼎门街，再以西全部破坏无存。据探，此街在长夏门以东，残宽59米，厚0.3米，距地表深1.3—1.6米，路土保存较好。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一般残宽在27米左右。”^②

可以发现，建春门街、永通门街在长夏门东侧较宽，到了长夏门西侧则明显变窄，考古报告中的解释为“长夏门以西保存较差”。作为洛南最主要的东西大街在此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且道路宽度锐减明显（宽度减少24—32米），恐非“保存较差”可以解释。

对比《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参见图2），其中主要门址所对应的街道均为双线，其他街道为单线，可看出绘制者所有意表现的道路分级之特点。建春门街和永通门街^③在长夏门以东表现为贯通的双线，以西则以不规则的单线联系，似可与考古勘探中“（永通门）街在长夏门以东，残宽59米，厚0.3米，距地表深1.3—1.6米，路土保存较好……（建春门）街自建春门到长夏门街一段保存较好，在2800多米长中路土从未中断”的描述互证。图中所反映的道路分级系统和区域道路特点，与考古勘探数据惊人相似。

其二，宫皇城的夹城。《宋会要辑稿》^④和《河南志》^⑤均提到皇城西面有外夹城，但《宋史》^⑥并未提及。而述及北面应福门时，《宋史》记其为皇城西门（西三门之最北一门），《宋会要辑稿》称其为“西京皇城外挟城北面一门”，《河南志》云“北面一门曰应福门，门西向其城，至微缺一角”。仅从文字分析，应福门究竟是西向还是北向，是西夹城之门还是皇城之门，是难以判断的。但若结合《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可见皇城西部确有夹城，夹城以北微缺一角，与文献记载一致。而缺角之西向有开门，故推测这一缺角西向开门即文献所记之应福门（参见图2）。

20世纪50年代在隋唐洛阳城西寻找东周王城时，将王城东墙和北墙上发现的唐代修补痕迹和东墙北端的唐代夯土墙联系起来。^⑦杨焕新认为这“说明在东周城东侧，唐宫城西侧，确实有一小城存在。与文献记载相对照，不难看出它即是宫城西侧的夹城……并进行了实地调查，此夹城宽约200米”^⑧。经杨焕新调查，认为夹城“北墙与玄武城南墙连接，南墙大概在现洛阳市中州路以南，西工电影院西南的位置上”。将20世纪50年代的隋唐洛阳城实测图和东周城址实测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隋唐东都城址的勘查和发掘”续记》，《考古》1978年第6期。

③ 根据“东面三门，北曰上东门，西对东城之宣仁门。隋曰上春，唐初改。中曰罗门，无榜，当是取罗郭之义而名之。南曰建春门，建春门在府城东南一十里。隋曰建阳，唐初改。按韦述《记》，中曰建春，南曰永通，永通，周广顺中犹存。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2页）可知图中所绘最南一门应为永通门，其对应永通门街。事实上，经考古发掘证实永通门位于图示位置更往南一坊的位置，该图纸绘制有误，可能与北宋时期永通门已废塞有关。

④ “西面外挟城又二门，南曰丽景、东对金耀门；北曰开化，东对乾通门。北面一门曰应福。”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270—9271页。

⑤ “西面外挟城，又二门，南曰丽景门，东对金耀门，《五代实录》皆云上阳门，疑曾更易。北曰开化门，东对乾通门。北面一门曰应福门，门西向其城，至微缺一角。”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第154页。

⑥ “皇城周回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标点本，第1418页。

⑦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⑧ 杨焕新：《略谈隋唐东都宫城、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4—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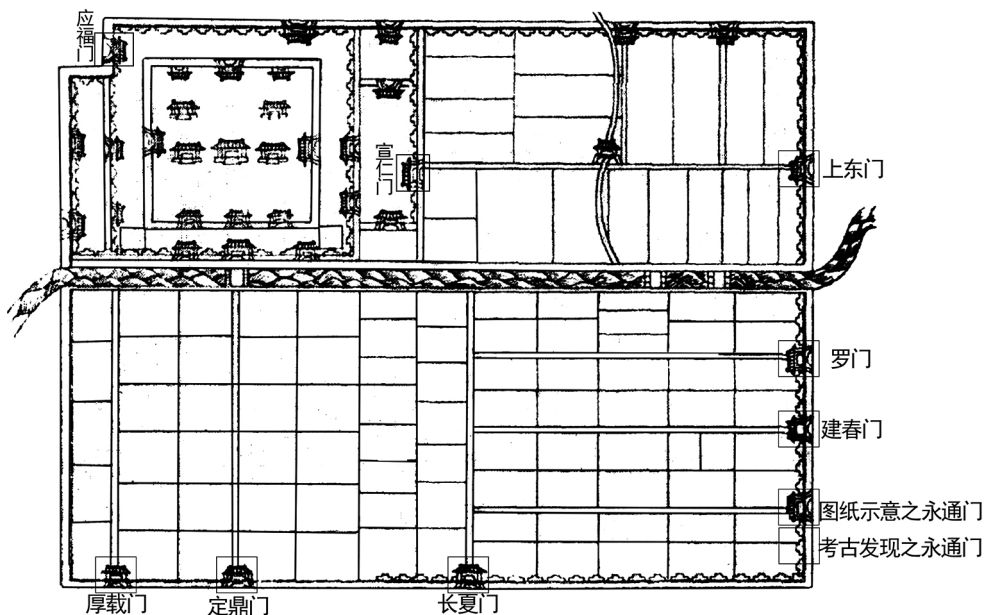


图2 《河南志》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中门址和道路情况

图等比例合并后也可见类似的结论，即西面夹城的北墙与玄武城南墙相直。其南墙若位于中州路以南的位置，则跟东城南墙基本相直，颇具对称性（参见图3）。



图3 北宋时期西夹城位置示意

说明：本图乃笔者参考《隋唐洛阳城 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略谈隋唐东都宫城、皇城和东城的几个问题》等文综合绘制而成

考古所见城西夹城，北至玄武门南墙，向北确“微缺一角”，与文献和图纸记载相吻合，但其具体形制和功能尚待更多考古发现。

其三，东城宣仁门位置。考古工作者在洛阳老城区西大街，东距十字街口 40 米左右发现宣

仁门遗址。^① 根据文献记载，宣仁门向东应该进入上东门街，并抵洛阳城东墙上东门。

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发掘所见宣仁门使用长条柱础石，且南门路面用砖铺砌，还有石砌车道，推测为唐末北宋时期门址。该门址位于唐宋东城东墙偏南的位置，与《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和《宋西京城图》中所绘位置有着较高的相似度，而与《唐城阙图》中将宣仁门绘于东城居中的位置不太一致。那么宣仁门的位置自唐至宋是否有所变动，这一变动对于城市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是需要在未来工作和研究中注意和回答的问题。（参见图1、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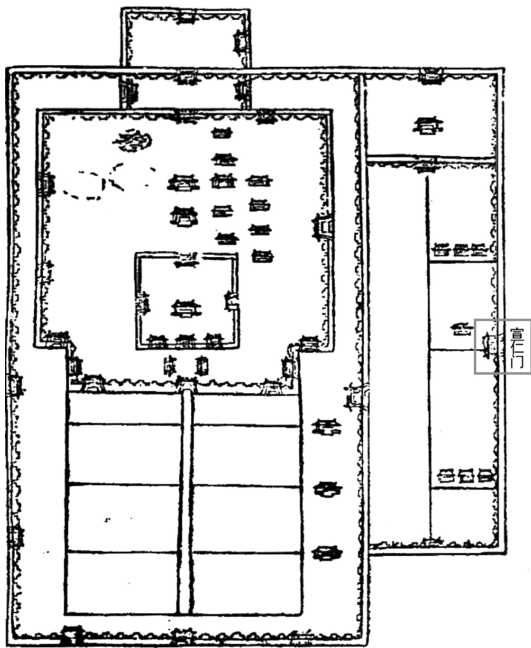


图4 《河南志》：唐城阙图

徐松言“左图右史”，意在强调图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缪荃孙也云“遂令照抄数纸，知此图非后人所能造”，足见《河南志》图之重要性。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研究的过程中，已发现《河南志》所载图纸有所讹误。以《唐宋河南府城阙街坊图》为例，其唐宋城址的形状、唐永通门的位置、里坊的尺度等皆有错误，且其反映的是唐宋时期混合的城市面貌，并非某一个时期的剖面。这些认识应该成为我们客观认识这批图纸的基石，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既强调它所承载的丰富历史信息，也要多加对较、甄别，不可盲从。

综上所述，《河南志》保存了大量宋本原文，是研究唐宋洛阳城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其所附图纸从图像学的角度记录了城市格局，反映了一些志文难以描述的城市空间关系，同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为我们认识唐宋洛阳城提供新的视角。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隋唐城宣仁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11期。